

# 大数据时代数字化生存的时空嬗变 及其时空稀缺\*

管其平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社会发展是社会依托自身所处的空间维度并随着时间的自然变化而进行空间生产的社会性过程,并在这种循环往复的社会生产中推动了社会现代化进程。随着工业文明的迅猛推进以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日渐成为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人类已俨然进入大数据时代。如今,在万物皆数的大数据语境中,传统社会循环延续的时间结构和相对稳定的空间形态均发生了空前变化:流动时空日渐超越地方时空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主要逻辑;时空形塑了社会,社会内嵌于时空,时空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的社会性和稀缺性日渐呈现。本质而言,大数据时代,技术的进步和各种数字场域的建构为个体赢得了丰富的时间和空间,不断精细时空,塑造各种碎片时空,建构各种数字空间和数字化生活。但需要警醒的是,生活方式从在场时空向缺场时空的转向,也潜在隐喻着时空资源的重新分配与整合。数字化生存的实践场域中,资本和权力借助流动时空不断调整自身的运作方式,其时空扩张和收缩能力远远超过数字化生存中的个体,以创造性破坏的方式占有个体的碎片时空,以超地域联结的方式挤压个体的心理时空,以差异性消费的形式规约个体的消费时空,以再嵌入的形式支配个体的在场时空,这一系列事实引起数字生活的时空紧张感、危机感和贫穷感。

**[关键词]** 大数据时代 数字化生存 流动时空 算法规制 时空权利

**[中图分类号]** C91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2)01-0063-09

## 一、引言

恩格斯曾富有见地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与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sup>[1](P91)</sup>换而言之,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立足于不同

时空情景、遵循不同时空秩序,争取不同时空资源,进而生产不同社会产物的时空过程。毫不夸张地说,经由时空组成的时空语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经由时空组成的时空秩序是社会稳定的前提,而建立在差异时空语境和时空秩序基础之上的时空资源和时空权利则是

收稿日期:2021-06-09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网络社会的现实基础、本土特色与运行模式研究”(19JJD840003);安徽大学社会学学科研究生创新研究项目“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空间路径研究”(SZCXSHB202101)

作者简介:管其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网络社会学研究。

维系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循此思之,自古以来,社会系统运行的确定性和社会生活的稳定性都与特定时空语境中的时空资源、时空秩序和时空权利密切相关。随着信息技术和大数据革命的迅猛推进,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以信息和数据为社会基础的大数据时代,这也使传统社会循环延续的时间结构和相对稳定的空间形态发生了颠覆性变革。大数据时代,技术对时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主体间“时—空”和身体性“时—空”两个层面。<sup>[2]</sup>在技术对个体主体间性和社会的不断深化和塑造过程中,作为社会存在的时间与空间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并由此建构了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和新的社会运行方式。

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指出,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sup>[3]</sup>大数据时代,数据技术构筑的数字社会空间几乎重新构建了传统人类社会生活的时空形态,个体生活的时空情景日渐数字化和数据化,生活状态的时空弹性、时空黏性以及时空韧性日趋增强。总体而言,与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相比,大数据时代的生活方式已逐渐从“定栖式”的静态生活向“动态式”的流动生活转变,从传统的在场性生活向缺场的数字化生活转变,数字化生活已成为大数据时代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我们置身新世界,我们需要新的理解”<sup>[4](P4)</sup>,经由大数据构筑的数字化生存方式的到来是值得欢呼鼓舞的社会大事件,我们不能否认数字化生存的到来给已有生活世界带来的颠覆性变革。但在欣喜数字化生存带来红利的同时,也需注意网络场域的数字性、社会性、大数据本身的算法和记录引发的主体间性的断裂,并由此加速时空稀缺性、加速性、商品性与消费性,进而引起时空资源分配不均衡的事实。本质而言,大数据营造的数字化生存方式为个体赢得了时间与空间,但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的感受却事与愿违,我们没有时间,“哪怕我们赢得了时间的富足”,<sup>[5](P7)</sup>

我们没有空间,即便我们拥有多种社会空间。对照卢梭“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sup>[6](P8)</sup>的象征性论断。我们也可以说,数字化生存是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资本和权力的引导与规训之中。正如哈维所言,一切问题最终都可以被还原为关于空间和时间的问题。<sup>[7](P19)</sup>有鉴于此,研究以时间与空间为切入点,又以其为落脚点,揭示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生存实践中,资本的流动和流动的权力是如何在新的时空语境中挤压个体支配在场时空和缺场时空的机会,进而诱发日常数字生活的时空贫穷感、危机感和紧迫感的社会事实。

## 二、时空之维：理解社会生活的关键维度

时间与空间是衡量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变革的关键维度,是建构共识性社会和差异性社会认同的基础,两者之间的相互演化象征着事物的变化、发展以及运动,没有时间的前进与空间的拓展,人类社会及生活将失去应有的社会意义。简而言之,时间与空间具有显性的社会性,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其源于社会生活,又影响社会生活。数字化生存作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仍然离不开时间与空间,且时空之于数字化生存呈现出更为丰富的价值与意蕴。

### (一) 时间与空间的社会之蕴

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积累的实践过程诠释了“时间消灭空间”的思想。他认为,资本越发展,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会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sup>[8](P273-274)</sup>这揭示了资本通过时间与空间实现自身积累、增值的事实。韦伯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之间的“选择亲和性”阐释了“有效运用时间”的“新教伦理精神”是如何在“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引导下上升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之一。后现代地理学家哈维又进一步提出“时间—空间”修复策略,这

是一种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sup>[9](P94)</sup> 具体而言,“时间修复”是资本积累在固定的空间结构内部进行的调整过程,而“空间修复”是“时空修复”失灵的时候进而寻求外部空间转移的时间性过程。<sup>[10]</sup> 大数据时代,时空变化反映的是社会作为现代性产物的一种事实性逻辑。正所谓,“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sup>[11](P14)</sup> 所有的生产活动,与其说是一个不可更改或永久性的要素集合,不如说是在时间性与空间性之间互动的过程。<sup>[12]</sup> 网络研究的扛鼎之人卡斯特也表达了类似观点,“空间与时间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维度”。<sup>[4](P466)</sup> 鲍曼则指出当时间和空间从生活实践中分离出来,当它们彼此分离,并且易于从理论上解释为个别的、相互独立的行为类型和策略类型时,现代性就出现了。<sup>[13](P13)</sup>

概而言之,时空既是社会生产的构成性要素又是社会生产的社会产品,内含极强的社会属性。首先,社会实践是赋予时空社会性的基础,时空变化蕴含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其次,时空是影响社会生活的关键变量,是特定社会关系的载体,个体总是基于自身的时空观念在一定的时空场景中进行社会实践以争取一定的社会资源。最后,时空具有社会价值,时空直接参与了特定社会关系的建构,对时空的控制、占有和分配关系体现着社会权利的分配。为此,有学者论到,社会学理论对于现代时间与空间的理解大致是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线索,突出强调时间与空间作为社会的要素或维度如何体现了现代社会工具性化的特征。<sup>[14]</sup>

## (二) 数字化生存的时空属性

数字化生存是大数据发展与主体自我选择的综合结果,其依赖高度规划性、组织性的网络场域,是个体在数字空间中,通过数字技术顺利进行信息传播、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的过程。<sup>[15](P160)</sup> 换句话说,数字化生存是个体在信息技术构筑的数字社会空间中,依托一定

的时空情景,遵循一定的场域规则,进行一系列数字行为的过程,其源于在场生活又高于在场生活,是对在场生活的继承和超越。因此,数字化实践的过程,或者说,生活场域的时空转向过程既包含在场资源在缺场空间的重新集聚与分配,又包含缺场资源对在场空间资源的占用和挤压。因此,时空权利也即数字化生存中,个体能够获得并有效支配在场时空和缺场时空的机会和能力。

列斐伏尔曾通过构建“空间表征—空间实践—表征空间”的分析框架解释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在其看来“空间表征”是政府、投资者和规划专家等所设想或设计的空间,是资本和权力实现其空间生产目标的方式,“空间实践”是对社会构成物进行生产的一个过程与结果,“表征空间”则是空间使用者生活和体验的空间,是使用者之间基于利益关系相互作用出来的一种社会关系,被支配的空间。如果将这一空间理论应用到数字空间中,也可以说,承载数字化生存的空间本质上是掌握资本和权力的集团利用“空间表征”进行“空间实践”进而生产出“空间表象”的过程。换言之,数字化生存是在资本和权力预设的各种场域中进行的,且这些时空场域并非独立而是相互连接,一种空间往往具有包含着诸多空间的功能。这也表明,在大数据时代,社会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化逻辑是网络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关键特色,而信息技术为网络化逻辑扩散至整个社会结构提供物质基础。<sup>[4](P567)</sup>

## 三、时空流动: 时空嬗变中的资本和权力

时空之间的密切关系及其呈现的社会性使时空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借此,时空也成为掌握资本和权力的优势集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地位、利益的工具。事实上,每个社会形态都建构客观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

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用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性生产实践。<sup>[16](P377)</sup>大数据社会作为一种迥异于传统社会的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其必然建构适合自身发展的时空逻辑,并以此开展符合数字化生活的社会实践,而资本和权力也将以流动时空开展利于自身的物质生产实践。

### (一)“流动时间”与“流动空间”

正如厄里所言,当代技术和社会实践所基于的时间框架,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自觉经验。<sup>[17](P523)</sup>在此基础上,卡洛尼亚提出“中间时间”来契合现代社会的时间框架,所谓“中间时间”指一天中人们单纯的等待将要来的人或等待什么事情发生的那些时间。<sup>[18]</sup>卡斯特则使用“无时之时”概括了信息技术影响下的时间嬗变,无时之时即是指产生于当某个既定脉络——信息化范式和网络社会的特征,导致在该脉络里运作之现象的序列秩序发生系统性扰乱之时间。<sup>[4](P429-430)</sup>很明显,信息和大数据使以往常态化、例行化的时间认知、时间秩序被打破,与之而来的是一种具象化、抽象性的时间经验。也意味着,信息技术能够以不同方式加快或放慢外在化的时间或者说改变时间的排列顺序,时间也能够被随意“拼贴”出现了共享时间,时间的流动性和可塑性增强。进而言之,数字化生存的时间存在既具有同时性又具有异时性。

空间是具有时间性的空间,时间是具有空间性的时间,当已有时间因技术发生重组,与之相对的空间也会发生变化。随着数字空间的完善,数字化生存中,流动空间逐渐取代地方空间,成为支配数字实践的主要活动场域。流动空间也即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sup>[4](P383-384)</sup>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受地域性活动的支配。<sup>[19]</sup>且从社会实践来说,在场社会的社会关系都是发生在特定的地域中,人与人之间具有互动的直接性。但数字化生存赖以存在的

网络社会是一个与传统“在场”社会有着较大差异的“缺场”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脱离了传统的地域性限制,具有了跨越时空的穿透力和重组性。吉登斯将其称之为“脱域”,也就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sup>[20]</sup>这也表明,网络使维系和衡量传统社会的时空秩序发生了颠覆性变革,流动成为社会和生活的特质,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流动社会和流动生活构成了网络社会的实质特性和数字化生存的本质特征。但流动并非指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发展或变化,而特指“生活政治”的流动,是“资本流动”“权力流动”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流动和解体“流动”。<sup>[13](P12)</sup>

总体而言,新时空的演化也是时空去客观化、地方化而不断实现社会化、商品化的过程。如今,“金钱、时间和空间的相互控制形成了我们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的一种实质性的连接系列”。<sup>[21](P282)</sup>事实上,在大数据不断建构和解构过程中,数字化生存拥有的时空具有了超出以往的密度和厚度,我们能借助网络将过往、现在及将来时间进行统一,活动空间也已不再仅局限于地方性的地理空间,而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流动性社会空间之中进行无限的空间畅游。

### (二)权力和资本的流动形态

哈维认为,空间与时间在社会事务中始终表现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sup>[21](P299)</sup>这呈现了时间与空间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的重要性。在数字化生存中,权力、资本与时空进行更为默契的联袂表演,其自身运作模式也因时空嬗变发生变化。借助数字空间,资本和权力不仅能够以更快的时间达到更广阔的空间,而且还能以更加隐性的方式占有和支配时空资源。

从权力变化看,流动权力优于权力流动。通常意义而言,数字化生存中的流动权力主要包括自由进入、使用网络的权力以及网络化的

权力。但数字生活需依赖各种差异性空间,而这些空间的设定是由资本家和技术精英共同完成的,其基本的原则是通过设定不同的场域规则进行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作为实实在在的普通公众往往难以参与空间生产的权利,而仅仅具有进入权和使用权。这也表明,数字化生存中,权力的展示形式是一小群技术精英通过设定相应的空间来注视大多数普通公众,但是社会支配的运作乃是通过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架构里选择性地吸纳和排除某些功能与人群而得以达成的。<sup>[4](P531)</sup>也正是在这种权力的嬗变过程中,掌握技术的精英群体通过将自身的技术要素转化为权力要素和社会要素深入到日常的数字实践中,并对个体行为进行规训,且这种权力展示在空间上是规训性的,在时间上是始终在场的,致使个体的日常行为和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引导、监视与控制。

从资本变化来看,传统有限地理空间中潜在的资本危机被无限数字空间所消解。资本是一种革命的生产方式,总是不安地寻找新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和剥削模式,因此也寻找新的时空客观定义。<sup>[22](P273)</sup>资本借助流动的时空将资本扩张的意志发挥到了极致。传统社会的资本运作通常会受到客观地域的束缚,有时难以进行空间的便捷交换,因为建立在物质空间基础之上的设施是难以移动的,但是在流动空间中,资本能够将这种物质空间转换为虚拟的符号,资本的呈现由笨重的实体变成了轻盈的液体,能够轻易地占据时空、垄断时空,进而剥夺个体时空。资本通过向各种消费场域注入资金占据市场份额,即通过对支撑流动空间的物质设施的占有对数字生活的数字空间进行垄断,也正因如此,个体不得不在资本和权力规定的空间中进行数字实践。

#### 四、加减之间:数字化生存中的时空稀缺

正因时间与空间具有社会性属性,时空权

利本质上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权利。已有实践表明,时间、空间、资本、权力与网络技术五位一体式组合所能带来的绝不只是预想中的进步和发展,还有可能使数字生活沦为纯粹的市场资源和资本的权力场域,并带来一系列生活时空张力的事实。如前所言,传统时空经由网络在时空向度上分别表现为“无时之时”和流动空间,但也因时空在人类社会中的元特质,使资本和权力在具体实践中形成了一种缜密的结合体,对个体碎片时空、心理时空、消费时空及现实时空的支配达到了新高度。

##### (一) 个体碎片时空的占有和支配

时空碎片化是资本和权力依托网络场域进行生产与再生产的必然结果,网络场域实质上成为资本和权力占有和支配个体碎片时空的有效工具。数字化生存中,资本和权力通常以创造性破坏的方式对承载数字化生存的网络空间进行布局、重组和利用,继而侵占个体的时空资源。

其一,借助时空流动,资本和权力对碎片时空的侵占与控制变得肆无忌惮。数字化生存依赖于各自独立但又时刻处于联系的网络场域,这使数字实践的系统性实践被无限分割,并以一种无序的形式存在。在这种事实之上,个人生理层面的时间、工作时间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日益碎片化。而资本与权力深知碎片时空蕴含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通过营造各种场域加剧数字实践的程式化。例如,消费主要集中于京东和淘宝,聊天集中于微信和QQ。可以说,资本和权力通过技术精英将原本被“闲置”的零碎时空重新利用了起来,将原本包含不同社会实践的行为空间交织起来,并通过设置各种时空规则(诸如支付场域、娱乐场域的积分等级规则)来占有个体的碎片时空。对碎片时空的任意拼接与剥夺成为资本和权力的常态社会设置。此外,资本和权力借助流动场域将个体在时空上的整体性(主要表现为单数意义上的时空自我)被打碎,被分割成多个孤立的自我(主要表现为复数意义上的时空

自我)。显而易见的是,吃饭、逛超市、坐车等闲散时间都漫游在网络营造的时空场域,我们在抖音、快手等数字空间中往往忘记在点击的时间中看到了什么,这使我们的数字化生存丧失了主动性和活力性。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现在的日常生活已经丧失了日常生活曾经具有的品质与活力,这种日常生活就像被挤压成了碎片,然后按片出售的空间”。<sup>[23](P550)</sup>

其二,资本和权力利用算法和大数据记录个体碎片时空,使短暂的空间掠夺与持久的时间规训相互渗透。虽然个体数字化生存拥有更多的时间,也可在更短时间内漫游更多空间,但这种时空轨迹正日益被资本和权力量子化。数字化生存的实践以数据为基础,数据代表个人的生活实践,于是控制数据就控制了个体碎片时空的活动。例如,饿了么、美团、大众点评等根据数字个体在网络数字实践中留下的痕迹打造个体的信息图谱与图像,并根据自身目的对个体施加影响,从而强烈剥夺个体自由支配碎片时空的权利。所以,事实上我们并非在操作自我喜爱的东西,而是在碎片时空中,你喜欢看什么就给你推荐什么,如同“韭菜收割”般的时空占有。有学者指出:“个体所面对的空前庞大的潜在事件集于纷至沓来的碎片化机遇使得不变的物理时间单位变得相对短暂了”。<sup>[14]</sup>可以说,在规定的数字时空中,虽然个体能进行多样化的空间实践,但是牺牲了时空成本,却仅仅维持了基本生存。

## (二) 个体心理时空的占有和支配

资本和权力对碎片时空的支配引起了一种普遍心理共识,即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乃至你在哪里工作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能在碎片的时空之流中证明自己不可或缺的社会价值。严格意义上讲,这种心理认知引导个体在数字化生存中对地位、金钱及价值的追求陡然上升,导致社会的竞争越来越大,进而加剧心理时空的“自我”和“他者”挤压。

其一,数字化生存中个体参与或完成工作的心理时空代价增大。资本和权力将工作转移

到网络场域,使“劳动时间具有分散性,劳动地点具有漂移性”。<sup>[24]</sup>这使维系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工作不必局限于在场空间及在场的人,而是能够依托缺场时空来完成。同时,劳动形式通过数字技术连接,形成一种“非物质劳动”状态,这种“非物质劳动”不断改变社会实践的形式,并生产出新的心理时空关系。因此,数字化生存的普遍状况是“工作—闲暇关系总是以矛盾的方式历史地表现出来”。<sup>[23](P27)</sup>无论是“007”还是“996”工作模式都表明资本和权力对时间的细化已达到极致,这也使细算时间成为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心理秩序,更内化为每个数字成员的社会认知。因为,当时间作为一种资源,有可能被过多的活动消费掉,时间的稀缺性会受到强化。<sup>[25](P58)</sup>在此基础上,个体愈加重视时空衍生出的社会价值,并加剧对时间资源的争夺与占有。最终带来的是个体不惜以牺牲自身的人文心理需要,而无限地追求物欲的极端,引发主体间性的断裂。

其二,网络增加了心理时空在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维度上的复杂性。在社会分工日益分化的现代社会,激烈的社会竞争把压力转移至个体,个体为了在社会中占据较为理想的位置,不得不竭尽全力获取更多的支配时间与空间,这就直接引起人的自然心理属性以及社会心理属性皆全面发生异化,进而引起人们情绪上的普遍焦虑、紧张,心理空间不够阔大,容易冲动。换言之,心理时空在大规模工业生产体系以及市场交换场域中,被赋予了制度的内涵(时间是制度文明的体现)和市场价值的属性(时间是商品价值的基础),这引起作为“主体人”的“在场我”与作为“数字人”的“缺场我”在心理体验上的抽离,进而使在场时空的我在数字化生存中产生了认知上的困惑,难以有机整合缺场时空中的“主体我”适应数字化生活的新空间,甚至生发“我是谁”的心理困惑。此外,标准时间的设置使原来相对稳定的心理秩序发生动摇。比如通过美团等数字空间订购外卖,会显示几点几分订购成功,商家

几点几分接单,外卖骑手几点几分送达。我们即便是在刚下单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去看这些时间点,如果在预计时间达不到,我们的心理便会感到焦虑,并产生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如鲍曼所言,“人们害怕被弄得措手不及,害怕没能赶上迅速变化的潮流,害怕被抛在了别人后面,害怕没留意‘保质期’,害怕错过了调转方向得良机而最终走进了死胡同”。<sup>[26](P6)</sup>而“时间资源越是短缺,并且因此生活节奏的加速越大,对加速技术和加速科技的需求越大”。<sup>[5](P180)</sup>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又不太思考实际的时间,而是以感觉的方式、以模糊的方式经历着时间。<sup>[17](P509)</sup>

### (三) 个体消费时空的占有和支配

时空在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变使时空的商品性得以凸显,这种商品性一方面指时空本身作为一种资源的价值性,另一方面则指个体劳动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正因如此,资本和权力以商品化和消费化为基本原则,通过构建各种环境奇观来规划和拓展主体消费的实践场域,创建出各种差异性消费时空,从而实现从剥夺劳动到剥夺时空强制消费的转变。

其一,资本和权力借助算法支配个体消费时空的话语权和选择权。数字化消费实践中的消费看似是自主性的消费需求和行为,但其本质上是被资本和权力借助技术精英依靠算法塑造出求新、求异的体验式和沉浸式时空所束缚的消费。日常场域消费转换中,资本和权力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对个体的消费时间、消费空间及消费行为进行着“润物细无声”引导。由于时间的被无限分割,数字化生存的个体时刻处于被连接或待连接的消费状态,这种聚集和整体消费引导使消费品的生产者及推销者同消费过程的垄断者和宰制者构成一股强大的权力网络,将个体的消费时空变成可控制的符号系统。于此而言,真正决定消费过程的,不是消费者的主体需求,而是资本和权力的需求。进一步言之,个体的消费时空也就成了资本和权力宰制者的对象。可以说,数字化生存中的一

切实践活动都融入消费过程,而消费过程又将人及其日常生活以及整个社会活动转化成一种符号和符号结构,取得了对个体消费时空的支配权,使人完全丧失个体掌控自我消费时空的权利,严重限制了消费选择的自主性。

其二,资本和权力不断挤压个体的未来消费时空。在数字消费实践中,资本和权力借助流动时空,将数字生活与未来数字实践紧密结合,通过设置各种场域规则诱导消费者对出售未来时空。由于流动时间与流动空间的存在,尤其是时间的可逆性增强以及生活程式化的进一步加剧,个体的数字生活实践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事实呈现的社会结果便是未来时空能以一种经济价值存在的方式内嵌于日常生活中,能使未来时空蕴含的消费价值在当下呈现。在数字化生存实践中,资本和权力不仅竭尽全力占用和挤压当下的消费时空,而且深刻规制个体的未来消费时空。“双十一”购物节就是一场在网络进行的一场有预设的数字实践(引导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惯习),其强大到我们可以违背自然的生物时间(熬夜)进行购物。换言之,在数字化生活中,资本和权力通过符号的运作将未来时空作为一种潜在的经济资源予以呈现,并通过虚拟的抽象关系使其能够以独立的方式呈现,致使个体拥有的未来时空成为可供资本和权力任意摆布和攫取利益的消费时空。

### (四) 个体在场时空的占有和支配

当数字化生存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我们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减少了,而我们进入网络信息时代前,更为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是个体能以触摸、感觉等无数种方式所感知、认知和想象的世界。但在场生活与缺场生活并不是一种对立性存在,而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资本和权力也利用这种辩证的关系实现自身的发展,直接挤压个体的在场时空。

其一,资本和权力赋予网络时空更多重要性。在传统社会中,个体的时间与空间也相对有限,但社会分工的精细化程度较低,社会

个体基本能够保证时间与空间皆是“我”的产物,可以随时安排自己时间也可以不断开拓自我空间。数字化生存使用的各种场域是资本和权力预设的空间。由此可见,我们的生活具有显著的被给予性,我们的时空资源不断被资本和权力所攫取。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社会化和在场生活的数字化,越来越多的社会要素在资本和权力的塑造下以流动性、符号性的方式在数字空间中呈现。有鉴于此,网络时空也越来越影射着现实时空,数字化生存实践越来越具备在场社会实践的功能及相关特质,它既影射着传统现实社会,又在形成自己独有的社会系统和文明。我们许多在场的生产与生活都必须依赖缺场完成,而缺场的时空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们的在场频率、在场时长和在场的投入程度。但这也造成个体的独立性和社会的原子化。正如鲍曼在流动社会中对人际关系做出的诊断那样,“人的生活犹如滑冰,要想不跌倒就必须保持高速度”,其结果,人变成了没有联系的人,社会也成了原子化的社会。<sup>[13] (P52)</sup>

其二,资本和权力将在场情境转换为以数据为载体的信息符码,实现缺场时空与在场时空的并置。数字化生存中,主体能够超越地理空间的时空障碍实现远距离的即时“全真性”场景互动,而且这种互动可以根据个体的心理需要随意切换,使行动者得以同时与多个不同网络时空里的互动对象实现即时性互动,这使社会交往环境的真实性与虚拟性在此发生了互渗,个体的社会属性因此而影像化和符号化。资本和权力通过布局网络空间的内容、打造网络场域符号话语,引导个体数字行为,个体在这种社会空间中又往往扮演着在场生活世界难以或根本无法实现的社会角色,满足了精神生活之需的同时受到资本和权力的控制,沦为资本和权力的附庸。

## 五、结语

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唯有不确定性能够确

定的大数据时代。社会具有显性的时空逻辑,时空本身也具显性的社会逻辑,时空不仅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衡量标识,更是显示不同社会差异的有效方式。

首先,我们正处于一个被数字“围困”的大数据时代,数字化生存已成为新的生活方式。对人类来说,没有技术的生存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sup>[27] (P14)</sup>同时,“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sup>[28]</sup>

其次,每一次技术变革塑造新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同时也会塑造新的社会结构与时空结构,进而改变个体的生活世界。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以及智能数据技术与数字空间的深度融合,数字化生存作为网络时代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必将随着网络技术与资本、权力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加强,甚至出现新的存在方式,这也意味着在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生存中,个体与数据、网络之间的界限和区分将会逐渐消失,长久以来外化于人的网络很有可能会逐渐嵌入人自身,最终在不知不觉中沦为资本和权力奴隶的数字劳工。

最后,保障数字化生存权利的基础是个体能够自我支配时间与空间。技术进步带来的时空增多与个体所能感知并拥有的时空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时空资源分配不均和时空权力的剥夺问题。数字化生存中,个体不能有效地获取时空资源、不能有效维护自身的时空权利,其数字化生存就如同“行尸走肉”。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分析数字化生存中的时空悖谬,并非否定数字化生存,而是通过批判性分析,增强个体对数字化生存本质的理解以及增强个体维护时空权利的意识,提高数字化生存能力。

## 参考文献:

- [1][德]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2]吴红涛.技术、空间与生命伦理场[J].道德与文

- 明, 2017(6): 126-133.
- [3]刘洋, 陶庭马.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哲学转向[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1): 68-72.
- [4][美]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等,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5][德]哈尔特穆特·罗萨. 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 董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6][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7][美]大卫·哈维. 资本的限度[M]. 张寅,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 [8]林密. 马克思“以时间消灭空间”的空间生产思想及其深层逻辑探微[J]. 哲学研究, 2019(12): 13-31.
- [9][美]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M]. 沈晓雷,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10]孙全胜. 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生产批判的逻辑[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5): 526-533.
- [11][英]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 译.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12]郑雄飞. 地租的时空解构与权利再生产——农村土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探索[J]. 社会学研究, 2017(4): 70-93, 243-244.
- [13][英]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社会[M]. 欧阳景根, 译.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2.
- [14]郑震. 现代性: 空间激增与时间荒——概念重建与时空的具体性[J]. 广东社会科学, 2020(6): 184-194.
- [15][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 数字化生存[M]. 胡泳, 范海燕, 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
- [16][美]大卫·哈维. 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C]//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17][英]约翰·厄里. 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A]//布赖恩·S·特纳. 社会理论指南(第二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18]季念. 手机传播中的时空重塑——2000年以来国外学者关于手机与时空关系研究述论[J]. 文艺研究, 2008(12): 62-72.
- [19]何镇飏, 王润. 新媒体时空观与社会变化: 时空思想史的视角[J]. 国际新闻界, 2014(5): 33-47.
- [20]刘波亚, 李金玉. 网络空间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逻辑[J]. 教学与研究, 2019(4): 98-104.
- [21][美]大卫·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 周宪, 许钧, 阎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22][美]大卫·哈维.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 胡大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23][法]亨利·列斐伏尔.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地三卷[M]//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关于日常生活的哲学). 叶齐茂, 倪晓辉,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24]汪金刚. 信息化社会生产与数字劳动异化——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阐释[J]. 新闻大学, 2020(2): 80-93, 122.
- [25][德]约翰·哈萨德. 时间社会学[M]. 朱红文, 李捷,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26][英]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生活[M]. 徐朝友,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 [27][美]唐·伊德. 技术与生活世界: 从伊甸园到尘世[M]. 韩连庆,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28]陈德齐. 银行学的革命——兼论比特银行学[J]. 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2): 56-59.

【责任编辑 史 敏】

##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and Scarcity of Digital Survival in the Era of Big Data

GUAN Qiping

**Abstract:** Social development is a social process in which society relies on its own spatial dimensions and undergoes spatial production with the natural changes of time, and promotes the process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in this cyclical social production.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ata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daily life, and mankind has entered the era of big data. Nowadays,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where everything is counted, the time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cycle and the relatively stable spatial form have undergone unprecedented changes: time and space have distance, distance and space have time, and the flow of time and space is gradually surpassing local time and space to become dominant. The main logic of social life:

(下转第83页)

hukou and local homeownership have better childcare function. And the more complete and larger the family structure, the higher the family income, the lower the average wage level in the city, the better the childcare function of mobile households; Mobile households with incomplete core structure and trunk or extended structure, urban hukou and local homeownership have better eldercare function. And the larger the family size, the lower the family income, the lower the average wage level in the city, the better the eldercare function of mobile households.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indicate the imperfections of the current family's childcare and eldercare function and its multiple impact paths. It is imperative to construct and improve the family-oriented social policy that covers the migrant population.

**Keywords:** mobile family; family changes; family function; childcare function; eldercare function; modernization theory

---

(上接第71页)

time and space shape society, society is embedded in time and space, and time and space as a social resource are increasingly presenting their sociality and scarcity. Essentially,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digital fields have won a wealth of time and space for individuals. They continue to refine time and space, shape various fragmented time and space, construct various digital spaces, and shape digital life. But what needs to be vigilant is that the shift of lifestyle from present time and space to absence time and space is also a potential metaphor for the redistribu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resources. In the practical field of digital survival, capital and power constantly adjust their own operating methods with the help of flowing time and space, and their ability to expand and contract in time and space far exceeds that of individuals in digital survival. They occupy individual fragmented time and space in a way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The way of geographical connection squeezes the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time and space, regulates the individual's consumption time and space in the form of differential consumption, and controls the individual's presence time and space in the form of re-embedding. This series of facts has caused the time and space tension, sense of crisis and poverty of digital life.

**Keywords:** big data era; digital survival; flowing time and space; algorithm regulation; time and space rights